

早期耶稣会的建筑知识及其传播与内化

——以明末利玛窦建筑活动的相关背景为中心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volution of Jesuit Architecture: A Case Study of Matteo Ricci's Building Activity in the Late Ming

肖靖 | XIAO Jing 谢晓欢 | XIE Xiaohuan

摘要：本文着重从早期耶稣会的建筑教育与书籍使用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至明末时期在华的建筑活动及其特征。据《北堂藏书》和费赖之所撰写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所罗列的会士名单与建造活动来看，西方古典建筑知识体系得以在华落地生根，不应仅归结于会士的个人艺术创造。建筑体系的在地化，需要依靠完整且具目的性的教学以及相当规模的建筑书籍的使用，两者能在遥远的东方以建造形式支持其宗教活动。本文以明末利玛窦在华建筑活动的开启出发，分析了耶稣会建筑在华传播与内化初始阶段的背景，并对其在肇庆所建的中国第一座耶稣会建筑“仙花寺”进行探讨。

关键词：耶稣会、内化、北堂藏书、利玛窦、仙花寺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building activities and their characters of the Jesuit Architecture in the late Ming period,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and books. According to P. Louis Pfister's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and *Catalogue de la Bibliotheque du Pe-tang*, we see the collective creativities of the Jesuits as the consequence of systematic training and usage of books, both of which sustain a constant flow of building knowledge into China. By analyzing Matteo Ricci's early activities and the first Jesuit building "Temple of Flower" in Zhaoqing during the late 16th century, the paper underlin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volution process of Jesuit architecture.

Keywords: Jesuits, Involution, Pe-tang collection, Matteo Ricci, Temple of Flower

一、“耶稣会学制”与耶稣会建筑风格

“耶稣会学制” (Ratio Studiorum, 全称“Ratio Studiorum of Society of Jesus”), 1599 年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由教廷首次颁布，目的在于通过系统化教育，迅速培养高素质的耶稣会神职人员，作为反对宗教改革的主力。^[1] 根据该学制体系，耶稣会以建立初级学院 (Studia Inferiora) 与高级学院 (Studia Superiora) 为主要方式，提供包括基础文法教育、中级哲学教育以及高级神学教育等三个等级的研习。尤其是高级学院，以培养教会领袖人才为己任，侧重哲学、神学教育与学术研究，形式上类似于现代大学与研究

所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中，硕士学习内容包括伦理学、逻辑学、自然科学等，神学阶段则提升为教会法 (Canon Law) 与教会史等。这种教育形式通过耶稣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与影响力，被包括葡萄牙科因布拉 (Coimbra)、印度果阿 (Goa) 和澳门圣保禄学院 (St. Paul's College) 等海外学院所复制，并在当地教区不断培养本土教士；同时，作为耶稣会网络的中继点，各学院会接纳从欧洲远道而来的教士，使之在旅途中得到不间断的高等教育，最终成为合格的传教士。

《耶稣会学制》的哲学教育，不仅涉及各种门类的自然科学，也包含以“应用艺术” (applied

作者：
肖靖，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
谢晓欢，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项目编号: 51978403)；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一般项目 (项目编号: GD17CYS01)

arts) 为导向的多种技术性训练。通常, 这种混合式训练都会采用课堂讲述、小规模讨论以及私人辅导课的形式, 主讲教士选择性地传授当时西方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 而这种针对性课程会持续长达 4 年时间, 教师通常具有相当深厚的自然科学功底。例如, 利玛窦 (Matteo Ricci) 的导师 Christopher Clavius (1538—1612) 是耶稣会中一位顶尖的数学教授, 他不仅主持罗马学院 (Collegio Romano) 的数学课程长达三十载, 同时也教授算学、几何以及天文学课程。在他的培养下, 利玛窦在入华传教的最初阶段, 就以叹为观止的科学知识打动了明朝官员与文士。无独有偶, Orazio Grassi (1583—1654) 作为罗马学院的另一位数学教授, 也同样有能力亲自主持设计罗马圣依那爵教堂 (St. Ignazio) 和罗马学院的教士住宅, 他也为当时各君主国设计了包括热那亚学院在内的耶稣会机构。这些自然科学教授的建筑活动, 从侧面上反映出正规教育体系中, 耶稣会士可以接触到相当程度的建筑学知识。例如,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 16 世纪耶稣会哲学教材中呈现出丰富的科技素材, 一本名为 *Annotationes in regullas arithmetices dictatae...scriptum Lutetiae parissierum Anno Domini, 1567* (编号 BNP Lat.11243) 的教科书包含有逻辑学、数学、几何、天文学等科学知识, 另一本 Jean Francois 于 1621 年撰写的上百册教材, 包含机械制图、水法与物理学。^[2] 有趣的是, 机械与物理学课程更多体现出对于“军事建筑”的偏好, 诸如 Pierre Bourdin (1595—1653) 教授的 1636 年度“数学导论”课程突出了几何学和算学在军事要塞设计中的应用。^[3]

这些材料证明, 经过长期的哲学科目培养, 耶稣会士可能知晓部分工程技术、书籍和实际中的成熟案例, 并逐渐创造出一种被称为“耶稣会风格”的新建筑式样。尤其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兴起之后的 100 年, 关于建筑学的著述与研讨在 16 世纪中期已臻佳境, 教会也意识到提出“自己的建筑风格”的重

要性。建筑史家保罗·弗兰考在他的著述 *Principles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中首次引入关于耶稣会建筑的“新形式”理论^[4], 但学术界历来对于“是否存在‘耶稣会艺术风格’”的问题有较为广泛而深入的争论。^[5] 这种争论的起因, 一方面是由于在“耶稣会学制”的课程中, 建筑学教育并未得到类似数学、几何等门类的同等重视, 未能形成独立的学科。建筑史学家鲁道夫·威特科沃 (Rudolf Wittkower) 和 Geoffrey Scott 早期也曾参加过这种争论^[6]; 包括 Giovanni Sale 和 Richard Bösel 在内的历史学者都认为, 单纯从耶稣会教育本身出发的研究, 无法支撑起一门称为“耶稣会建筑风格”的学说。另一方面, 在同一本书中, 哈佛大学 James S. Ackerman 教授也试图梳理耶稣会后期建筑设计方法与理念的诸多源流, 这种潜在关联似乎能从早于伯拉孟特、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设计师的前文艺复兴建筑风格诸多案例中找到线索, 他认为这些线索还隐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数百份 16—17 世纪耶稣会建筑图纸档案中。^[7] 在 Ackerman 看来, 耶稣会建筑的式样并不属于自身的创造, 在前期实践中都能找到更为古老的原型。换句话说, 耶稣会建筑式样并不具有独立的合法性, 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定为古典建筑形式的世俗化和低级化。耶稣会采取这种方式, 更多是出于方便世界范围内建造宗教场所的需求和效率, 而并非严格树立一个经典的“范式”, 让各地精确效仿和执行。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耶稣会早期所广泛采用的建筑学纲要 *De ratione aedificorum* (关于建造的方式), 这本刊印于 1558 年的指导读物基本囊括了教会推行的正统建筑式样。几乎与此同时, Giovanni Tristano (活跃于 1555—1575 年间) 作为耶稣会“建造事务主管” (consiliarius aedificiorum), 确实也曾制定过一系列控制教会建筑式样的规定; 不过, 没有明显证据能够说明上述著述和式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过系统的应用。^[8] 毋庸置

疑, 建筑师 Giuseppe Valeriano (1542—1596)、Bartolomeo Ammannati (1511—1592)、维尼奥拉的忠实信徒以及圣彼得大教堂的最终设计师 Giacomo della Porta (1532—1602), 都参与了耶稣会早期建筑的设计与建造。

二、早期来华会士的建筑教育和书籍

19 世纪后半叶, 由费赖之撰写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记录了 450 余位来华耶稣会士^[9], 记录中涉及各种类型建筑设计或建造活动的会士多达 60 余人; 其中, 至迟康熙年间的中早期阶段, 建造活动主要集中于原籍意大利地区的会士, 而后期活动则多为法国外方传教会士主导。所载雍正朝以后活跃于朝廷的意大利籍会士只有 Francesco Folleri、郎世宁 (Giuseppe Castiglione) 和潘廷章 (Giuseppe Panzi)。本文集中关注于早期耶稣会在华活动, 如此统计表明, 从 1582 年耶稣会首次进入广东腹地开始, 至 1644 年顺治改元的 60 年间, 共计约有 15 名会士曾在华有建筑活动记载, 其中来自现今意大利地区的有 7 人, 占据总名单的一半; 来自葡萄牙有 5 人, 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各仅 1 人 (表 1)。在这些早期会士尤其是意大利籍会士的教育背景中, 大都包含有哲学科目的训练; 像罗明坚、利玛窦、熊三拔 (Francesco Sambiassi) 等人, 都有涉及和掌握更为精细的自然科学类别, 包括数学、地理学、几何学、物理学等, 这些科目应该都隶属于中级哲学训练范畴。龙华民、郭居静等意大利会士, 以及罗如望、阳玛诺、万密克、费乐德等来自其他地区的会士, 也有明确地接受过高级神学训练, 这意味着他们也同样通过了中级自然哲学科目。这就解释了为何在进入明朝疆域后的 60 年, 会士能够在广东、江西、江苏、浙江、北京等地开展教堂或者居所的建造活动。

正如先前所讲,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的教育背景与建造活动 表 1

姓名	教育背景	年份	地点	具体建筑活动	国籍
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	数学	1582	肇庆	同巴范济 (Francesco Pasio) 筹划建造第一座耶稣会在华建筑	意大利
利玛窦 (Matteo Ricci)	数学、地理学、几何学、物理学, 以及各种相关知识		肇庆 韶州 南昌 北京	欧式、华丽教堂; 中式住所; 1 座欧式大礼拜堂; 1 座欧式礼拜堂	意大利
龙华民 (Nicolò Longobardo)	哲学、神学	1603	靖村 韶州	中国第一座“教堂”?	意大利
郭居静 (Lazzaro Cattaneo)	文学、哲学、神学	1608 1612	上海 杭州	1 座大教堂; 1 座教堂 ^[10]	意大利
罗如望 (João da Rocha)	哲学、神学		嘉定	1 座教堂	葡萄牙
庞迪我 (Diego de Pantoja)	地图学	1610	北京	利玛窦祭拜堂	西班牙
高一志 (Alphonse Vagnoni)	古典学、哲学、修辞学	1611	南京 蒲州	1 座主教堂, 中国第二座; 1 座教堂	意大利
阳玛诺 (Emmanuel Diaz Junior)	神学 (澳门圣保禄)、天文学、地理学		杭州	1 座华美教堂	葡萄牙
艾儒略 (Giulio Aleni)	文学、哲学、数学、几何学	1620	福建 (泉州) 杭州	8 座教堂, 15 座礼拜堂; 1 座教堂 ^[11]	意大利
傅汎际 (Francisco Furtado)		1630	西安	1 座教堂	葡萄牙
金弥格 (Michel Trigault)		1630—1665	陕西	22 座教堂	法兰西
林本笃 (Benoit de Mattos)		1636	海南	4 座教堂	葡萄牙
万密克 (Michael Walta)	文学、数学、神学、哲学	1638	蒲州	改建 Alphonse Vagnoni 原教堂	日耳曼
毕方济 (Francesco Sambiasi)	许多科目, 数学	1641	南京 广州	山上 1 座教堂; 1 座教堂	意大利
费乐德 (Rodriguez de Figueredo)	拉丁文、神学		开封	1 座华美教堂	葡萄牙

展建筑设计建造活动，需要依赖系统的自然哲学训练，同时也需要广泛搜集相关建筑图书，建立属于教会自身的图书馆。^[12]这种图书馆藏包含欧洲原版的宗教典籍、各种自然哲学门类的书籍和图册，建筑学书籍理所应当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利玛窦发现，同明朝文人官员交流的便捷方式之一是书籍，之后他也将明朝传教事业由神学传播转为科学技术导向^[13]，势必更为依赖科技图书的使用。1613—1617 年，耶稣会士金尼阁 (Nicholas Trigault) 返回欧洲，向教宗及各地王公大臣搜集大量图书，以便在北京建立一座堪比欧洲的图书馆。这次史称“七千本入华”的运书活动便是“北堂藏书”的最初和主要来源之一。

历经 300 年辗转，现今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北堂藏书不足 4000 本。^[14]20 世纪 30 年代，历史学者方豪在北京接触到“北堂藏书”并描述称^[15]，该藏书含有大量关于历法天文、地理、器械、医学和生物学的著作，也包含建筑学书籍。我们查阅 1940 年出版的《北堂藏书书目》，并对比法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典藏库^[16]，可以梳理出若干有可能明代晚期已经在华使用的欧洲建筑类典籍，而这些书籍很可能便是金尼阁或者其他早期会士通过各种方式携带入华并使用的第一手建筑资料文献。^[17]

通过比对，我们能够检索出版年代早于明朝末年的若干建筑书籍，这其中包括：Jacques Androuet du Cerceau 撰写的

Livre d’architecture de Jacques Androuet du Cerceau (1611 年巴黎出版)，Bernardino Baldi 的《*De verborum vitruvianorum significatione...*》(1612 年)，丹尼艾莱·巴尔巴罗 (Daniele Barbaro) 的 *Vitruvii Pollionis : De architectura libri decem* (《建筑十书》，1567 年威尼斯出版，1586 年里昂出版) 和 *La pratica della perspetiva* (1569 年威尼斯出版)^[18]，Martino Bassi 的 *Dispareri in materia d’architettura, et perspettiva* (1572 年布雷萨 Bressa 出版)，多米尼克·方塔纳 Domenico Fontana 的 *Della trasportatione dell’Obelisco Vaticano* (1590 年罗马出版)，吉奥瓦尼·帕奥罗·罗马佐 (Giovanni Paolo Lomazzo) 的 *Trattato dell’arte della pittura, scoltura, et architettura, di Gio* (1585 年米兰出版)，Antoine Mizauld 的 *Hortorum Secreta, cultus, et auxilia...* (1575 年巴黎出版)，帕拉第奥 (Andrea Palladio) 的 *I Quattro libri dell’architettura di Andrea Palladio* (《建筑四书》，1601 年威尼斯出版)，赛里奥 (Sebastiano Serlio) 的 *Architecturae liber septimus, in quo multa explicantur, quae architecto variis locis possunt occurrere* (《建筑七书》，1575 年法兰克福出版) 和 *Sebastiani Serlii : Von der Architectur fünff Bücher* (1609 年巴塞尔出版)，Carlo Theti 的 *Discorsi delle Fortificationi* (1617 年维琴察出版)，以及 Ioannis Vredman de Vries 的 *Architectura : continens Quinque ornamenta Architecturae* (1633 年阿姆斯特丹出版)。我们知道，1583 年开始，利玛窦与罗明坚开始筹划在广东肇庆修建耶稣会第一座在华教堂和居所，利玛窦之后一路北上至京城，1605 年神宗赐地修建北京“南堂”，1610 年 5 月病逝于北京。这段时间，龙华民、郭居静、罗如望、庞迪我、高一志等人已在南昌、南京、杭州、上海和北京修建“华美”教堂。除却他们所具备的建筑学教育，上述北堂藏书目录将可能成为图书使用的备选，而其中不乏颇具影响力的建筑书籍。

年代最为久远的当属由巴尔巴罗注解

的维特鲁威《建筑十书》。作为帕拉第奥的学生和朋友，他曾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研究哲学、数学和视学，也是维特鲁威《建筑十书》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重新诠释的最为重要的译者之一。这个注释版本所采用的插图亦是帕拉第奥的作品。北堂藏书中的拉丁文版本是巴尔巴罗注释本的初版。同样，方塔纳 1590 年关于罗马城方尖碑的著述也是初版，他协助当时教宗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树立了圣彼得大教堂、人民广场（Piazza del Popolo）以及圣母教堂广场（Piazza di S. Maria Maggiore）的方尖碑。罗马佐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史评论方面的跨时代人物，他突破前辈瓦萨利（Giovio Vasari）的书写方式，将艺术作品从物质形象中脱离出来，在抽象词汇和概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批评；也是在他的推动下，手法主义（Mannerism）得到迅猛的发展。罗马佐在米兰出版的《关于绘画、雕塑与建筑》为北堂所藏，也是较早版本之一。相比之下，可能最为重要的建筑书籍应当算是帕拉第奥的《建筑四书》以及赛里奥的《建筑七书》。帕拉第奥在巴尔巴罗等威尼斯公国贵族的资助下，接替了珊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1486—1570）的威尼斯公国首席建筑师的身份；1570 年初版《建筑四书》已为读者全面展现了 16 世纪中叶的“帕拉第奥主义”（Palladianism）原型，尤其是别墅与皇宫类型建筑，此书在欧洲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北堂所藏的《建筑四书》年代距离其初版已三十年，内容涵盖古典柱式、特定建筑类型（乡村别墅）、城市设施与布局以及古罗马建筑遗迹。赛里奥的《建筑七书》同样是查阅古典柱式的重要参考书，年代则更为久远。初版刊印于 1537 年，北堂版本为 1570 年且为德语版。赛里奥的“建筑手册”中有他的导师巴尔达萨雷·佩鲁齐（Baldassare Peruzzi，1481—1536）的影响，后者针对罗马古迹做了第一手测绘图纸，使得赛里奥有机会首次尝试用建筑图版配文字的方式来阐释设计思想。凭借对古典建筑样式立面和平面的详细分析，这本书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

三、利玛窦在粤建筑活动及其在华耶稣会首座建筑

北堂所藏明末的建筑书籍，大体勾勒

出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早期会士建筑知识体系的情况。历史资料显示，罗明坚与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安顿下来以后，迅速修建了耶稣会在明朝疆域内（除澳门）的第一座教会建筑，同时也建成了首座图书馆，用以存放从欧洲和澳门学院运送而来的各种仪器和礼品，其中包含自鸣钟、圣母画像、印本书籍，还有威尼斯制造的水晶棱镜。利玛窦在自传中描述到：“……各种式样的图画与设计，还有些描绘着城镇、皇宫、高耸的尖塔、拱券、桥梁和华美的庙宇。”^[19] 结合利玛窦在华活动的年代，反观北堂藏书中版本相符的书籍，只有巴尔巴罗、赛里奥以及另外两位影响力稍逊的学者著作符合背景；其中，Martino Bassi（1542—1591）是来自米兰的建筑师，而 Antoine Mizauld（1510—1578）是一位法兰西数学家。我们可以相应整理出一份利氏在粤的早期建筑活动年表，作为讨论的参照（表 2）。

这个时间表显示出利玛窦可能参与过的耶稣会建筑项目的地点分布，包括肇庆、南昌、南京和北京，并且在其 25 年活动期间至少得到郭居静和在京意大利籍助手熊三拔的帮助；尤其是在肇庆府崇禧

利玛窦在华早期建筑及相关活动年表				表 2
年	月份	主要事记	备注	
万历十年 (1582)	12 月	罗明坚与巴范济（Francesco Pasio）至肇庆，筹划修建内地第一座耶稣会院	留居东关一里许，天宁寺（旧称安乐寺，始建于宋崇宁三年，1104 年）	
万历十一年（1583）		两广总督陈瑞被罢黜 ^[20]		
	夏	新总督郭应聘到任，招罗明坚赴广州	返回途中接肇庆知府王泮应允，返肇庆	
	9 月	罗明坚携利玛窦至肇庆府，筹建圣堂与居所；王泮赠予广州、澳门沿途通行“路照”	住陈理陶家。建堂地点位于东郊西江外，近 9 层在建崇禧塔 ^[21]	
万历十二年 (1584)	10 月	王泮邀利玛窦绘制《山海輿地全图》并加序，镂版刊印，分送友人		
	12 月	原设计的两层楼宇，完工首层		
万历十三年 (1585)		完成第二层，利玛窦题“圣童贞院”	已升任广东按察司副使的王泮送匾，正门书“迁花寺”（或称仙花寺），中堂又书“西来净土”。居所下层有 5 间，正堂为圣堂大厅，两旁各有 2 间客室。上层为司铎居所。并筹划购买周边民宅以拆毁，改建花园	
		王泮升任岭西分巡道，新任肇庆知府郑一麟		
万历十五年 (1587)	8 月	罗明坚、利玛窦被迫返回澳门		
万历十六年 (1588)		王泮于武昌升任湖广副巡抚，布政司布政使		
万历十七年 (1589)	8 月	新任两广总督刘节斋（刘继文？）夺仙花寺，欲建其生祠；利玛窦去往广东韶州，居南华寺	曾暂住城外光孝寺，瞿太素来访	

续表

年	月份	主要事记	备注
万历十八年 (1590)		利玛窦在韶州设耶稣会初级学院	汉人钟鸣仁（广东新会人）、黄明沙修习
万历二十年 (1592)		利玛窦在广东南雄开教	利玛窦曾回肇庆并见汤显祖（一说在韶州），时汤贬官广东徐闻，返家途中遇利氏，做《端州逢西域二生破佛主义、偶成两首》 ^[22]
万历二十二年 (1594)	7 月	郭居静到韶州（曾任印度果阿学院院长）；澳门圣保禄书院成立	韶州教堂始建年代不可考，仅知因 1616 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淮上书禁教，毁南京无梁殿教堂；1619 年韶州教堂与居所被关闭
		王泮又得利玛窦绘《山海舆地全图》	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标记由白君可氏转交王泮
万历二十三年 (1595)	5 月	利玛窦受兵部侍郎石星之邀，随往南京	进见鸿胪寺礼部侍郎徐大任，时遇明赴朝抗倭，徐劝退利氏
	6 月	利玛窦退南昌	见江西巡抚陆万陵，宗室建安王、乐安王诚邀，做《（上建安王）交友论》
	12 月	徐光启至韶州，至城西天主堂，遇郭居静	
万历二十四年 (1596)	1 月	利玛窦会白鹿书院院长章潢（本清）	
万历二十五年 (1597)	秋	郭居静携龙华民至韶州；徐光启得主考官焦竑赏识，乡试第一，留京会试	利玛窦升任耶稣会中国教区区长
万历二十六年 (1598)	7 月	利玛窦随礼部尚书王忠铭北上	南京总督赵可怀诚邀（赵可怀任南京应天巡抚时，曾得到利玛窦 1584 年版《广舆图》）
	9 月	利玛窦首次入北京	进见未果，月余返南京
万历二十七年 (1599)	6 月	利玛窦、郭居静在南京购屋建堂和居所	利玛窦与王忠铭、刑部侍郎王明远、刑部尚书赵参鲁、户部尚书张孟男、礼部尚书叶向高、国子监祭酒郭明龙、翰林院编修杨荆岩交往；刑部左事吴左海（吴中明）邀利玛窦重绘《山海舆地全图》；时贵州巡抚郭子章制作缩本，收于 1604 年贵州省志 ^[23] ；焦竑罢官回南京，与李贽会利玛窦
	10 月	庞迪我来南京	
万历二十八年 (1600)	春	利玛窦见徐光启	徐光启于南京见《山海舆地全图》，遂邀利氏
	5 月	利玛窦与庞迪我北上	7 月至年底，被禁闭于天津
万历二十九年 (1601)	1 月	利玛窦入北京，住礼宾馆	献万国图册、自鸣钟等；拜见阁老沈一贯；徐光启礼部闾试不中（1604 年中进士）
万历三十年 (1602)		利玛窦在北京制成《万国图》第三版	李之藻题记，凡六幅；澳门圣保禄大教堂初建
万历三十三年 (1605)	6 月	利玛窦遣人赴开封，查犹太人群与礼拜寺	徐光启撰《山海舆地图经解》
	8 月	宣武门内购得宅地，建居所，设堂	
万历三十四年 (1606)		徐光启与利玛窦决定翻译《几何原本》	李之藻任工部分司，出任山东
万历三十五年 (1607)		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抵京 ^[24]	
	春	《几何原本》前六卷完成	
万历三十六年 (1608)	3 月	利玛窦去信罗马 Acquaviva ^[25]	言中国有会院 4 座[对应前述名录，可能即为：肇庆、南昌（或南京）、北京、上海，前三座为利玛窦参与，上海会院为徐光启和郭居静参与]，会士 20 人，神父 13 人
	9 月	郭居静来上海开教，居徐光启乔家浜九间楼家中	后徐光启为郭居静在南门外别墅“双园”中建住所
		南昌初学院收 4 名学生	钟鸣仁等修习
万历三十七年 (1609)	12 月	上海开堂；龙华民抵北京	利玛窦撰写《天主教传入中国史》
万历三十八年 (1610)	2 月	利玛窦完成著作	包含肇庆开教和建堂历史；金尼阁 1614 年翻译为拉丁文版《基督教远征中国记》
	5 月	利玛窦逝世于北京；龙华民接替成为中国传教区会长	游文辉绘制利玛窦像；金尼阁、阳玛诺来华

注：具体月份不完全对应，西元纪年仅作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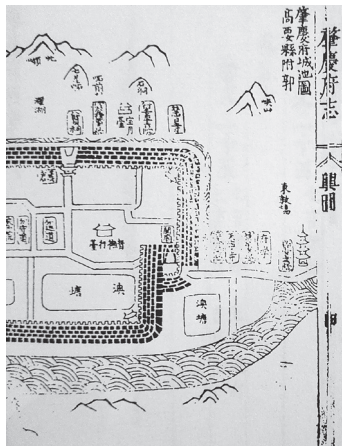


图1: 崇祯六年(1633年)肇庆府志刻本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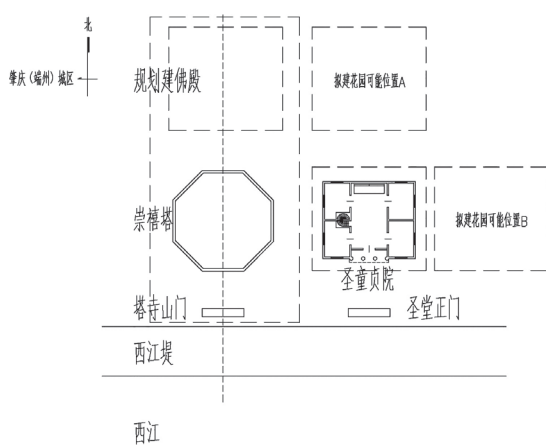


图2: 崇禧塔与仙花寺平面布局推想图

塔边建造中国第一座耶稣会建筑,过程十分复杂。尽管现今崇禧塔仍屹立于西江边(图1),但关于“仙花寺”的建筑遗迹则非常少,如今废弃的肇庆无线电厂和半导体器件厂址,据推断应当为利玛窦建圣童贞堂的基地。在初步尝试推想这座建筑之前,我们需要对其相关信息做一个历史回顾。^[26]

1583年,罗明坚与利玛窦经王泮许可,得到一处靠近崇禧塔的基地,用于建造耶稣会教堂与居所。这座八边形的宝塔位于城东“小石顶”,以此塔为中轴线,原先规划要建造一座佛殿,塔西侧则要修建王泮的生祠。当两位神父初次选定建堂基址时,计划放在佛殿的预留地。当时建造工程的负责人谭瑜告知利玛窦^[27],将佛寺替换为教堂,破坏了崇禧塔的风水。而塔东边的空地较为适合,也靠近道路。利玛窦从王泮处得到更换地皮的文书,并按照设计中的两层欧式建筑式样来施工,至1585年底竣工。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我们试图

还原出一个崇禧塔与仙花寺的平面布局推想图(图2)。

1583年崇禧塔已建成基座,此塔紧邻西江北岸,且塔门面向南边江堤。延伸此轴线至北侧地块,应为规划拟建佛殿处。罗明坚与利玛窦原定建堂于此,但因破坏风水一说,后换至塔东侧空地。^[28]依据谭瑜的说法,换地于此可避免耶稣会堂借用崇禧塔寺的山门,如此可保互不干扰;且塔东空地临近道路(推断即为其南侧沿江堤道路,光绪二年府志图版中载为“塔脚街”,现今去往老城区仍有一段称为“塔脚路”),更利于日常使用。圣童贞院与崇禧塔之间的距离,可从住院使用时一件事做推断。建造过程中,住院大门紧闭,村民不明就里;有孩童登崇禧塔顶,向住院内扔石头。这从侧面反映出住院应距离崇禧塔非常之近,很可能中间并无其他民宅。^[29]住院建筑本身的样貌并无遗迹留存(图3、图4),只知道其为两层西洋式建筑,规模不大,每层有5间房。首层中厅为礼拜

堂,两侧各有两间客房。上层中间为起居厅,两侧也各有两间房,为司铎住所。^[30]记载中,居所正面上层有三角形山花,且有能远望四周的露台。^[31]如此,可大致确定仙花寺相对于崇禧塔和西江的基本布局。事后,两位会士又买下临近几处民宅,拟建一座花园,可能方向有北向A地块和东向B地块。B相比A来说交通方便,其东侧为一老街(现今为肇庆市区主路之一“古塔路”,连接新建“阅江大桥”过江),相对来说更有利于加建教堂等需求。^[32]我们无法得知王泮划拨给利玛窦的土地面积究竟几何,或许原本地块已经涵盖了东至古塔路一侧宅地,如此利氏则很可能继续购买仙花寺北侧地块,以建花园。但据调研,由东侧古塔路回望崇禧塔,距离超过百米;似乎王泮并无恰当理由一次性划拨给利玛窦如此大的空地。综上,两位会士购买的民宅更可能位于B地块,以便沿塔脚街向古塔路拓展。

四、结论

本文试图论证一个现象,即不应片面强调耶稣会士来华展开各种早期建筑活动,乃至推及圆明园西洋楼建筑的完成,都归结于其拥有无比的建筑艺术才华。欧洲耶稣会风格的建筑形式能否在东方得以接受和内化,以及建造活动是否能得到顺利实施,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会士从《耶稣会学制》习得的相关自然哲学类知识,同时也需要运用有针对性的建筑书籍。这一点从费赖之的会士名单及其描述中得到印证,而《北堂藏书》所列举的若干明朝末年的建筑图书则是打开这段历史的钥匙。利玛窦在1583年初次进入广东内地时便能建造仙花寺,相关历史文献让我们有机会对这座两层欧式建筑的样貌和布局作了初步判断。但历史进程似乎并未给肇庆耶稣会院更多机会,旁边花园里也并未出现更为“华美”的教堂。在18世纪初法国会士魏方济神父(Francois Noel, 1651—1729)看来,杜加禄(Charles Turcotti, 1644—1706)和卫嘉禄(Charles



图3: 崇禧塔西侧王泮公祠原址



图4: 崇禧塔东侧古塔路回望,距塔百米余

de Belleville, 1656—1730) 在广州和佛山修建的美丽教堂, 似乎更值得呈现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

注释

[1] 关于《耶稣会学制》请参见: Allan P. Farrell, S.J. 译. The Jesuit Ratio Studiorum of 1599. Washington, D.C. Conference of Major Superiors of Jesuits, 1970. 教育结构与哲学教育, 见 40-44 页; 数学部分, 见 46 页。
[2] 法国国家图书馆编目号 BNP Lat. 14081。其中 64 ~ 73 册为机械, 74 ~ 100 册为水法。
[3] 法国国家图书馆编目号 BNP fols 92r-107v, "tractatus de ponderibus et machinis, sive de Mechanica"; "Tractatus Armentarium sive Machinatrix Militaris hellicas Machinas..." 编目号 BNP, fols 262r-425v。关于耶稣会与军事建筑, 参见: Denis De Lucca. Jesuits and Fortification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Jesuits to Military Architecture in the Baroque Age[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2。
[4] Paul Frankl. Principles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8: 31。
[5] 关于耶稣会艺术风格的历史争论, 涉及很多, 包括 Pierre Moisy, Jean Vallery-Radot, Pietro Pirri, Rudolf Wittkower, Gauvin Alexander Bailey 等学者。
[6] 参见: Rudolf Wittkower, Irma B. Jaffe. Baroque Art: The Jesuit Contribution[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72; Geoffrey Scott. 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ism[M]. London: Constable Co. Ltd., 1924: 25。
[7] 参见: Rudolf Wittkower, Irma B. Jaffe. Baroque Art: The Jesuit Contribution[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72: 16. James S. Ackerman, "The Gesu in the Light of Contemporary Church Design."
[8] Giovanni Sale. Architectural Simplicity and Jesuit Architecture[M]// John W. O' Malley, S.J. and Gauvin Alexander Bailey. The Jesuits and the Arts 1540-1773[M]. Philadelphia: Saint Joseph's University, 2005: 29-39。
[9] 费赖之(P. Louis Pfister) 于 1868—1875 年间完成初稿, 后于 1932 年由上海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出版, 中译本 1995 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0] 方豪. 中国天主教士人物传. 北京: 中华书局, 卷一, 1988, 95. 原文为: "杨廷筠筑华丽教堂一所……教士住宅一所……修道院一所。" 基于当时中国匠人普遍无法设计类似教堂的事实, 可以推测应该是郭居静帮助设计了杨廷筠的建筑。
[11] 同上: 191。
[12] 针对耶稣会在华建立的图书馆及其藏书, 比利时

鲁汶大学历史学者高华士做了深入的文本研究, 参见: Noël Golvers. Textual and Visual Sources on Catholic Churches in Peking in the 17th-19th century[A]//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from its beginnings to the Scheut Fathers and 20th Century.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29:9-21。
[13] 关于耶稣会在华传教方式的转变, 可参考包括 M. Hugo Brunt, J. B. Bury, Noël Golvers, Gauvin A. Bailey, Nicolas Standaert, César Guillén-Nuñez, Richard Bösel, Elisabetta Corsi 等学者的研究。
[14]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卷 1, 1988: 181-182. 方豪认定现今所存北堂藏书目录中仅剩 428 部书籍能确认为金尼阁所运书目。
[15] 方豪. 方豪六十自定稿. 台北: 学生书局, 1969: 62。
[16] (法) 惠泽林(Hubert Verhaeren). Mission Catholique des Lazaristes a Peking, Catalogue de la Bibliotheque du Pe-tang[M]. Beijing: Imprimerie des Laaristes, 1940. 关于北堂图书馆的变迁参考惠泽林《北堂图书馆的历史变迁》一文, 原文刊印于北京遣使会印书局 1949 年版《北堂书目》; 后翻译并收录于: (法) 谢和耐, 戴密微著. 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 149-174。
[17] 详细列表请参见笔者文章, 《纸上泰西——中国早期耶稣会士的图书馆与建筑文本》, 2017 世界建筑史与美术史教学与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18] 参见: 王凯. 中西交汇的地点: 明末《建筑十书》入华史考略[J]. 时代建筑 2012 (3) :114-117。
[19] 参见: Matteo Ricci.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3: 201. 金尼阁(N. Trigault) 编译拉丁文版, Louis J. Gallagher 依据 Pasquale D' Elia 所著 *Fonti Ricciane (1942—1949)* 做英译版。中文翻译版见: 利玛窦著. 利玛窦中国札记[M]. 何济高, 王遵重, 李申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第四章。
[20] 两广总督府原于肇庆, 1746 年移至广州。
[21] 崇禧塔位于城东"小市顶"肇庆知府王泮在任时建, 1582 年开建。塔旁后建王公祀。
[22] 参见: 徐朔方. 论汤显祖及其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92-102。
[23] 参见: Michel Destombes 所撰《入华耶稣会士于中国的地图学》一文, 原法文刊于 1983 年《尚蒂伊第三届国际汉学讨论会文集》。中文翻译收录于: (法) 谢和耐, 戴密微等著. 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 182-190。
[24] 据《会士列传》载, 熊三拔通神学、天文学、水法、绘像, 并协助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 之后 1612 年和徐光启著《泰西水法》一书。
[25] 利玛窦著, 《利氏致罗马总会阿桂委瓦神父书》(1608 年三月八日于北京), 载: 利玛窦全集 4: 利玛窦书信集[M]. 刘俊余, 王余川译. 363-377。
[26] 关于仙花寺的历史记载与相关评论, 数量巨大。例如, 费赖之、裴化行、夏伯嘉、史景迁等。本文不再另行引述。
[27] 《宣统高要县志》, 卷 23, 金石篇。王泮《新建崇禧塔记》载: "董之者邑人知县谭君瑜也。始壬午(1582)九月, 迄乙酉(1585)四月告成。"

[28] 利玛窦著. 利玛窦全集 1: 利玛窦中国传教史[M]. 刘俊余, 王余川译. 台北: 辅仁大学出版社/光启出版社, 1986: 133. "土地在花塔左边, 大门可开在花塔墙外。" 此书据译者说是依 Tacchi Venturi 所编辑 1909 年意大利版 *Commentare della Cina*, 但似应为 *Opere storiche (1911-1913)* 翻译而来。
[29] 如参见: 利玛窦中国札记[M]. 145-175。
[30] 参见: (法) 裴化行. 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248。
[31] 如参见: 罗光. 利玛窦传[M]. 台北: 光启出版社, 1960: 43-57。
[32] (法) 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Repertoire des Jesuites en Chine de 1552 a 1800*)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860. 据载, 尽管如此, 肇庆住院时间仅到 1589 年, 维持了 4 年。

参考文献

[1] Bailey, G. A. Art on the Jesuit Missions i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1542-1773[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2] 杜赫德.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中国回忆录[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3] Criveller, G., Guillen-Nunez C. Portrait of a Jesuit: Matteo Ricci[M]. Macau: Macau Ricci Institute, 2010。
[4] 韩琦. 通天之学: 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5] 黄兴涛, 王国荣, 编. 明清之际西学文本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6] Spence, J. D.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M]. New York: Viking, 1984。
[7] Venturi, P. T. Opere Storiche[M]. Macerata: Quodlibet, 1913。
[8] 徐宗泽. 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0。
[9] 朱维铮.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图表来源

图 1: (明) 陆鏊等纂修, 据《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影印,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 岭南美术出版社
图 2 ~ 图 4: 笔者自绘或自摄
表 1: 笔者依据《会士列传》摘录
表 2: 笔者依据《利玛窦书信集》《会士列传》等文献摘录